

关于王僧虔《论书》的文本问题及其相关论辩的学术札记

文笑盈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摘要】南朝齐王僧虔《论书》，为中国早期书法理论文献中问题较为繁复而影响深远之一篇。其版本流传、文本构成、作者归属及思想意涵等方面，历来为学界所关注，相关认识亦多歧异。近现代以来，张天弓、丛文俊、薛龙春等学者分别从文献考证、真伪辨析及书学思想阐释等不同立场出发，对《论书》展开系统论述，所据材料、论证路径与结论各有侧重。基于此，本文以三家研究为讨论中心，梳理其主要观点及论证依据，综合运用文献分析与比较研究的方法，对相关论辩加以考察，并通过不同研究取向之对照，探讨《论书》文本所呈现之复杂性。

【关键词】王僧虔；萧子良；《论书》；札记

【收稿日期】2026年2月16日

【出刊日期】2026年3月30日

【DOI】10.12208/j.ssr.20260078

Academic notes on textual issues and related debates regarding Wang Sengqian's *On Calligraphy*

Xiaoying We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Wang Sengqian's *On Calligraphy* from the Southern Qi Dynasty is a significant yet complex early Chinese theoretical text on calligraphy, marked by intricate textual issues and profound influence. Its transmission, textual composition, authorship, and intellectual connotations have long attracted scholarly attention, with considerable divergence in interpretations. In modern times, scholars such as Zhang Tiangong, Cong Wenjun, and Xue Longchun have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On Calligraphy* from distinct perspectives—textual criticism, authenticity analysis, and explication of calligraphic thought—employing different source materials, argumentative approaches, and reaching varied conclusions. This paper centers on the research of these three scholars, synthesizing their main viewpoints and evidentiary bases. Through comprehensive textual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methodology, it investigates the relevant scholarly debates and explores the complexity of the *On Calligraphy* text by juxtaposing different research orientations.

【Keywords】 Wang Sengqian; Xiao Ziliang; *On Calligraphy*; Notes

1 绪论

王僧虔《论书》一篇，历来被视为较为早期的书法理论文献。其内容由人物品藻，逐渐向较具系统意识之批评形态进行过渡。然其文本形态殊为复杂，自唐以来即多所歧异。今通行《法书要录》所收《论书》，其文兼具书家品评与书信陈述两类文体，其第一、三段以评鹭书人为主，第二段则近“与人书”之体；而张怀瓘《书断》复将其中部分文字系于萧子良名下。由是，《论书》在篇目构成、作者归属及思想指向等问题上，遂难以确指。

历代学者对是文处理不一。严可均《全齐文》据文体差异而分属王僧虔、萧子良；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则以为当作一篇完整书信观之。近现代以来，相关讨论益趋精密。张天弓先生就其文本分篇与文献系统加以

考辨，丛文俊先生侧重真伪与篇章结构之辨析，薛龙春先生则由书学思想史立场申论其理论意涵，本文不拟对《论书》作者及文本形态作定讞之论，而以以上三位学者诸说为中心，比较其论证方式与方法预设，考察不同研究路径如何形塑对同一文本之理解。藉此进一步学习书法理论相关论文写作方法与治学态度。

2 《论书》的文献形态与文本问题概述

现存《论书》文本自唐以来即呈多种形态。此处先就三位学者的研究内容，对《论书》版本问题进行整理：

其《论书》原文部分为：“辱告并五纸，举体精雋灵奥，执玩反覆，不能释手。虽太傅之婉媚玩好，领军之静逸合绪，方之蔑如也。昔杜度杀字甚安，而笔体微瘦；崔瑗笔势甚快，而结字小疏。居处二者之间，亦犹仲尼方于季、孟也^[1]。”

张彦远《法书要录》所收一文，今本多据明刻《津逮秘书》，内容通常分为三段，其次第自“宋文帝”至“谢静、谢敷”，继以“辱告并五纸”至“不妄言耳”，复以“钟公”至“韦诞”。

北宋朱长文《墨池编》则将其分为两篇，一为评书家之文，一为“与人书”之体（止于“不妄言耳”，不及“钟公”以下），并明确指出张彦远合二为一之处理“非也”。

南宋陈思《书苑菁华》本则又可细别为两种。一是清汪氏震绮堂刻本，又分为《论书》《又论书》两篇，其中《又论书》增录“钟公”以下文字。二是清《四库全书》本。

清代严可均编《全齐文》，则依文体与内容差异，将《论书》一分为四，分别编入王僧虔《论书》、萧子良《答王僧虔书》、王僧虔《与某书》，并将“钟公”条附于《论书》后。

南梁萧子显《南齐书·王僧虔传》所载“宋文帝”以下评书文字，与张彦远《法书要录》及陈思《书苑菁华》所收《论书》相比，所评书家明显为少，其中如王导等数人皆不见载。

清康熙间《佩文斋书画谱》所录此段，复较《南齐书》本文有所缺佚，且文字多有乖舛之处，如涉及鄙悖等语，尤显讹误^[2]。

综上所述，《论书》之根本疑点主要集中于三端：其一，论评体与尺牍体何以并存于同一文本；其二，文中各段究属王僧虔抑或萧子良；其三，其原始篇章形态究竟为一篇、二篇，抑或数种残篇之汇合。此类问题不仅关乎校勘与编次，亦直接影响对文本性质、写作背景及书学观念之理解。下文所论张天弓、丛文俊、薛龙春三家观点，正是在应对上述文本不确定性时所采取之不同研究策略。

3 关于三者观点异同之整理

王僧虔《论书》所呈现的文本问题，集中反映了文献考证与历史阐释在古代书论研究中的不同处理路径。张天弓、丛文俊、薛龙春三位学者围绕该文展开的讨论，在材料运用、方法选择及问题意识等方面各具代表性。本章不拟对其观点作并列式介绍，而是从文献考证、历史情境与思想阐释三个层面，考察其研究取向与论证方式，藉以探寻《论书》研究中不同方法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学术意义。

首先，张天弓先生的研究以文献考证为中心，其首要目标在于通过梳理早期文献记载，厘清《论书》在唐代以前的文本形态与作者归属。其论证主要建立在对

唐代文献的系统比勘之上。张怀瓘《书断》两次引“萧子良《答王僧虔书》”语，所涉及文字均见于今本《论书》“辱告”一段，此为判定该段作者归属的重要文献外证。同时，窦蒙《述书赋注》所载王僧虔《答竟陵王萧子良书》“序古善书人”，以及韩方明《授笔要说》转引姚思廉之语，其内容特征与今本第一、三段高度契合，显示出“评议书家之文”在唐代即以王僧虔答书之名独立流传。结合《法书要录》《墨池编》《书苑菁华》等文献的系统比对，张天弓据此提出唐代本存在王、萧分立的两篇文本，而宋以后逐渐合流的判断。此研究通过重建文献系统，确立了后续讨论的基本文本框架。

其次，丛文俊先生的研究在承认文献外证的同时，对其题署的绝对可靠性持审慎态度。其研究重心由单纯的考据转向了文本内部与历史语境的综合考察。丛氏的论证首先基于南朝宗王与士族交往的礼仪规范，指出若将“辱告”段视为萧子良之作，则文中对王氏先辈的称谓，全然不符当时的身份秩序与书信礼制。相较之下，若视其为王僧虔对萧子良的进谏之辞，则语气、称谓方能顺遂。此外，他结合文中“承天凉体豫”、“心目俱劳”等语，认为此类语感更贴合王僧虔晚年“多疾”的生命状态，而非萧子良青年时期的表达。丛文俊以历史情境与人物关系为校验尺度，提示文献考证须与时代制度、文化规范及个体经验参互印证，从而对单一依赖著录的判断路径构成了重要补充^[3]。

最后，薛龙春先生的研究则在接受张天弓基本文献判断的前提下，将讨论重心移向书学思想史层面，关注《论书》在永明至梁初书学观念演进中的枢纽位置。在文本结构上，他提出今本《论书》可能由多封往复书信合卷而成，如“钟公”以下条目或为王僧虔针对萧子良来信进行的补充评议。在思想阐释方面，薛龙春通过细读文本，重新界定了萧子良“疑”之微旨。他认为萧氏之疑并非针对王羲之本人，而是对当时“高尚子敬（王献之）”而冷落“逸少（王羲之）”的评价体系表示不满，从而将萧子良置于尊王书学传统的延续脉络之中。其研究体现了由考据入手而转向观念史阐释的路径，强调了文本在书学思想转型过程中的参与作用^[4]。

综合三家之论，可见其分歧并非单纯源于材料掌握之多寡，而更深植于对文献性质及研究目标的不同预设。张天弓先生之研究，以唐代文献著录与引文为最高证据层级，力图在可验证材料范围内还原文本之历史形态，其结论具有较强的规范性与可操作性，因而在文本划界与作者归属问题上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参照框架。然此一路径亦以内在假定文献题署与著录

在整体上具有较高可靠性，其解释效力在面对历史语境与书写礼制等非文献因素时，仍有进一步检验之空间。

从文俊先生之研究则明显降低了对单一文献外证的依赖程度，而以历史情境、身份秩序及文本语感作为重要的判断尺度，其“情理考证”并非否定文献，而是试图通过重构六朝政治文化与书信语境，对文献判断加以再校准。此一取向有效揭示了文献考证中常被忽略的历史前提，但其论证亦不可避免地引入解释性判断，需在材料可证性与情境推断之间保持谨慎平衡。

薛龙春先生的研究则在上述两种路径所划定的文本边界内，将讨论推进至书学思想史层面，其关注点不在于文本形态之“真伪”，而在于文本如何在永明至梁初书学话语中发生意义。其对文本结构的假设与对萧子良书学立场的重释，虽多属解释性建构，但为理解《论书》在书学观念演进中的功能提供了新的视角。

由此可见，《论书》研究并不必然导向单一结论，而是在文献厘定、历史反思与思想阐释的持续互动中，展现其作为问题文本的学术生命力。

4 王僧虔《论书》研究三家考辨方法启示

以上内容是对丛文俊、薛龙春、张天弓三位先生观点的整理与对比。虽然对各家结论各有取舍，但在治学方法上颇受启发。现将阅读所学记录如下。

首先关于版本歧异与文献流传问题：三位先生的讨论，使笔者认识到版本歧异背后往往隐藏着文献流传的复杂历史。《法书要录》所收王僧虔《论书》，至北宋《墨池编》已分为两篇，且脱去“钟公”以下四条；南宋《书苑菁华》又将此四条补入，明毛晋刊本再合为一篇。朱长文所见本与李昉《太平御览》所据本已有不同，其间分合增损，并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张天弓先生对此辨析甚细，明确指出何者为直接证据、何者为间接证据，何者当信、何者当疑，使笔者认识到版本研究并非简单比较异同，而是为了窥见文献流传的轨迹。

三篇文章中，给笔者启发最大的是证据轻重之别的处理。余绍宋先生凭“语气”断定“辱告”段为王僧虔书，这种方法用于文献考证略有单薄之感，论文写作并非完全不可使用此法，但若缺乏坚实证据支撑，论点力度难免削弱。论文写作仍需要加强实证的研究方法，更进一步追问历史真相^[5]。

张天弓先生举唐韩方明《授笔要说》引姚思廉语、张怀瓘《书断》两引萧子良语，这些都是唐人所见，时代相接，其可信度远非后人揣测可比。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几条证据相互关联，构成证据链条，并非孤立无援。

薛龙春先生则从文本内部寻求呼应，使萧子良信中“承阅览秘府”等语与前段评书形成照应。如此内外证结合，其说乃坚。二位先生这种不因情感偏重某条文献材料的研究方法值得进一步学习和借鉴^[6]。

其次则是书法文献考证，往往需要借助跨学科方法，如对书信礼仪的考辨及社会文化的探究^[7]。丛文俊先生强调萧、王之间君臣之礼，认为萧子良不当贬抑王僧虔先祖，此论或虽未能彻底推翻唐人之证，但其提醒不可忽视。南北朝士族交往，门第、官爵、辈分、亲疏皆有讲究，措辞稍有不慎，即失礼招讥。王僧虔上齐高帝启称“亡曾祖领军治”，这是对君之礼；若致书萧子良，自称其祖为“领军”而不加“亡曾祖”，是否合宜？萧子良若直斥王洽不如乃孙，是否失敬？此类问题，非谙熟当时书仪者不能置答。

薛龙春先生引六朝“题答”之例，令人耳目一新。当时书牍往还，有于原信纸尾批答者，有将数启装为一卷者，其文本形态与后世刻本迥异。数通书启合抄一卷，不标作者，不分起讫，日久传写，遂成一篇。以此解释今本《论书》三节并存之状，虽无确证，然其思路通达，较之“附抄旧文”之推测，更合文献流传之常理。由此悟及，研究古代文献，不仅当读其文辞，更当想见其形制。写本时代的文献与刻本时代的文献，性质固有不同。

最后，关于学术视野与时代特征。张天弓先生对南北朝整体论书风气的研究，展现了更宽阔的学术视野。永明年间书学著述，可得七八种之多，且皆成于短短十余年间，此非偶然。萧子良开西邸，集天下才学之士，沈约、谢朓、王融、萧衍皆在其中，讨论声律，编撰类书，研究文体，蔚然成风。书学研究之兴盛，实与此学术氛围互为表里。王僧虔以“天然”论书，萧子良考索书体源流，王融图绘杂体六十四书，王愔撰《文字志》网罗古今书家，或主玄理，或重小学，取向虽异，而共成一时之盛。读三家文，益知研究书论不可脱离其时代，亦不可脱离其学术环境。

以上是笔者阅读三篇文章后的几点感想。总而言之，朱长文、严可均、余绍宋诸家，皆为前修，其说各有依据。张天弓先生于严氏有取有舍，取其引《书断》之智，弃其割裂文本之失，态度平允。丛文俊先生从书仪角度补充材料进行论证，若未来能有更多文献证据则更完善。惜南北朝时期书仪相关文献证据的缺失，因礼仪较为具有稳定性，或可从唐代书仪中窥视一二^[8]。可见考证之事，当以证据为先，以情理为辅。旧说虽尊，可证则从之；新说虽巧，无证则置之。此乃朴学相传之法，今日犹不可废。

5 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王僧虔《论书》并非单一文本的静态呈现,而是在南朝书学交往语境中生成、流传与重组的复杂实践。张天弓先生通过系统梳理唐代文献,提出“二篇分立说”,为文本的篇章结构与作者归属提供了确证;丛文俊先生从历史礼制与人物关系出发,对题署的可靠性提出深刻反思,强调文本与书写语境、社会身份之间的互动;薛龙春先生则将考据成果置于书学思想史的演进脉络中,关注文本的思想功能与流通价值。三家研究各有所长,互为印证,共同揭示了《论书》在文献、历史与思想层面的多重面向。

由此观之,书家评议、尺牍往复与作者互动,使文本在早期便具备被拆分、重组及反复引用的条件。因此,对《论书》的理解,或可不仅拘泥于复原所谓“原貌”,亦可讨论兼顾其生成语境、书学交往机制及思想功能的综合分析。

参考文献

[1] (宋)陈思撰《书苑菁华》书苑菁华卷十一《晋王右军自

论书》,四库全书本,第4页。

- [2] 张天弓,《张天弓先唐书学考辨文集》,荣宝斋出版社,2009,198页。
- [3] 丛文俊.王僧虔《论书》考[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06):9-13.
- [4] 薛龙春.张怀瓘书学著作考论[D].南京艺术学院,2004.
- [5] 谢桃坊.略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考证方法[J].古典文学知识,2008,(05):3-11.
- [6] 胡守为.陈寅恪先生的考据方法及其在史学中的运用[J].学术研究,1980,(04):75-80.
- [7] 丛文俊.书法研究的学术思维与方法[J].中国书法,2016,(02):24-32+1+36-37.
- [8] 周一良.书仪源流考[J].历史研究,1990,(05):95-103.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